

重磅
品荐

一木见乾坤 探寻历史的隐秘线索

王小柔

六百年前,西南边陲的深山密林中,一株株楠木被冠以“神木”之名,斩断了与故土的千年羁绊。它们穿越险峰激流,跨越千里关山,最终矗立在紫禁城的宫阙之间,成为皇权的象征、盛世的点缀。然而,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会发现这些沉默的巨木,不仅承载着官殿的巍峨,更镌刻着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密码,记录着无数黎民的血泪与自然的悲鸣。

龚静染的《大明神木记》以“皇木”这一独特的物象为轴心,开创了新颖的“物史”写法。作者踏遍四川小凉山、大凉山的崇山峻岭,以田野调查为基,融合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等多重视角,将文献记载、口述传说与实地见闻编织在一起,还原了那段被遗忘的百万楠木北迁的血泪史。这部作品是一次对权力、欲望、人性与自然的深刻叩问。一木见乾坤,《大明神木记》让我们得以透过这根承载着六百年沧桑的楠木,窥见大明王朝的辉煌与崩塌,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神木神话是政治符号的建构

永乐四年(1406年),工部尚书宋礼奉朱棣之命入蜀采木,一场改变西南山川与大明国运的采木大役就此拉开序幕。在马湖府沐川长官司的黄种溪山,宋礼“偶遇”了一桩奇事:砍伐后的巨木竟“自行达于坦途”,挡路的巨石“夜闻吼声如雷,石刻自开”,木由中出,“肤寸无损,所经之处,一草不掩”。这则看似荒诞的传说,经宋礼上奏朝廷,迅速演变为一场盛大的政治叙事。朱棣龙颜大悦,赐黄种溪山为“神木山”,遣使致祭并建祠立碑,翰林院侍读胡广撰写《神木山祠记》,将其诠释为“圣德所致”“神衷宣宣,嘉视斯应,以兆皇基,万世永盛”的天命象征。

“神木”的神话,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建构。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得皇位,亟须通过营造宏伟都城、神化皇权来巩固统治。而“神木自出”的传说,恰好为其提供了绝佳的舆论支撑——采办皇木不再是劳民伤财的工程,而是顺应天意、彰显皇德的神圣之举。胡广在碑文中用“皇帝有诏,取材于蜀,神木之山,峨峨是属”的华丽辞藻,将西南深山的楠木与皇权紧密绑定,使“神木”成为不可亵渎的政治符号。此后,大明王朝的官殿营建,便在这层神圣的外衣下,持续了近两百年。

然而,神话的背后,是赤裸裸的权力博弈与现实逻辑。所谓“神木自行”,不过是西南山区暴雨引发山洪,巨木借水流之势移动的自然现象。六百年后,当我们重读《神木山祠记》,那些光芒流丽的文字背后,已然露出历史的裂痕。而这根被神化的楠木,也从此成为大明王朝命运的隐喻:看似坚不可摧、天命所归,实则根基早已在谎言与掠夺中悄然腐朽。

千里迁徙血泪铺就的皇木之路

“入山千人,出山五百”,这句流传于西南地区的蜀谚,道尽了皇木采运的惨烈。《大明神木记》以细腻的笔触,还原了巨木从深山到京城的千里迁徙之路,每一步都浸染着役夫血泪与生命的代价。

皇木的采办,首先要跨越的是西南山区的天险。马湖府境内的楠木多生长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深山密林中,“层

峦峭壁,矗矗尊崇,深谷谿呀,飞流怒凉”,人行尚且艰难,更何况要砍伐、搬运二三十米长的巨木。砍伐一棵巨木,往往需要数十上百名役夫轮流作业,“斧斤斯人,林披薄斂”,在没有现代工具的年代,仅凭人力与简单的器械,要将千年古树伐倒,本身就是一场生死考验。书中记载,工部少监谢安被派往夔州石夹口采木,“亲冒寒暑,播种为食,二十年乃还”,去时青壮年,归时已垂垂老矣。而更多的役夫,则永远留在了深山之中,或死于坠落、或死于劳累、或死于瘴气,“委官幕役疲死、杖死、客死,禁于圜、羁于旅、行乞于市,前后相望”。

砍伐之后,巨木的运输更是一场浩大的工程。从深山到江边,需要“辟林为栈,跨涧为梁”,铺设临时栈道,再由数千名役夫“千里拽运”,用绳索将巨木沿山路拖拽而下。在陡峭的山路上,役夫们“徐步曳武,犹虑僨路”,稍有不慎便会车毁人亡。到达江边后,巨木被编成木筏,沿长江顺流而下,经三峡、过江汉、涉淮泗,最终转入京杭大运河,运往北京。这条千里水路,同样危机四伏,“木入大江,需用头舵、橈夫共计七千九百六十九名”,沿途的暗礁、急流,随时可能吞噬木筏与役夫的生命。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目睹皇木运输的场景,在日记中写道:“河上是巨大的木筏和满载木材的船,成千上万的纤夫正拉着船在岸边爬行,极为壮观。”这份“壮观”的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破碎与血泪。

从四川深山到北京紫禁城,一根皇木的迁徙,往往需要一两年甚至三四年的时间,耗费数万人力,牺牲无数生命。当我们站在今天的北京庆丰公园,望着那根来自四川的金丝楠木与乾隆皇帝的《神木谣》诗碑,仿佛能听到六百年前役夫们的喘息与悲鸣。那条千里皇木之路,不是一条通往盛世的光荣之路,而是一条由血泪铺就的苦难之路,它承载着大明王朝的虚荣与欲望,也埋藏着一个帝国走向崩溃的伏笔。

皇木案与改土归流

西南边疆,一直是大明王朝治理的薄弱环节。这里族群杂居,土司割据,“编发,披毡,左衽,侏离,信鬼不药”,与中原文化格格不入。而皇木采办的深入,犹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打破了西南边疆的政治平衡,引发了一场关乎制度变革的风暴,其核心便是安鳌之死与改土归流的推行。

安鳌,马湖府土知府,一个充满矛盾与张力的历史人物。在《马湖府志》的记载中,他是“修桥补路、兴学敬神”的贤太守;他率铜铸玉皇神像,饰以纯金;重修忠武侯庙,“一毫不赋于民”;修建姓香桥与进贤路,让“行者以安,游者以乐”。兵部尚书余子俊曾用《诗经·周颂·天作》中的诗句赞美他,将其比作文王般的圣人。然而,在《明孝宗敬皇帝实录》中,他却是“性残忍,暴虐民”的酷吏,最终以“凌迟罪八、斩罪十二、绞罪三”的罪名被诛杀。

安鳌的双面人生,本质上是土司制度与中央集权矛盾的集中体现。作为马湖府的世袭土司,安鳌一方面需要通过“兴学敬神、修桥补路”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赢得民心与朝廷的认可;另一方面,在中央集权日益加强的背景下,他又必须通过高压手段维护家族的“小王朝”,抵御朝廷对边疆权力的渗

透。而皇木采办,恰好成为这场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朝廷以“为民除害”为名废除土司,实则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更好地控制西南地区的资源,包括皇木在内的各种战略物资。而马湖府的百姓,虽然摆脱了土司的残暴统治,却依然要承受皇木采办带来的沉重负担。这场由皇木案引发的边疆风暴,最终以制度变革的形式载入史册,但那些被卷入其中的个体命运,却如西南山区的尘埃,消散在历史的风烟中。

权力游戏中的命运沉浮

《大明神木记》不仅还原了宏大的历史事件,更塑造了一幅鲜活的众生图谱。从位高权重的采木大臣、土司官员,到身处底层的役夫、工匠,再到专权乱政的太监,每个人都被卷入皇木采办的权力游戏中,他们的命运或荣或辱、或生或死,都与这根沉默的楠木紧密相连。

太监群体的介入,让这场权力游戏更加复杂。明朝宦官专权始于永乐年间,朱棣因夺位过程中得到太监的助力,对其格外重用。在皇木采办与官殿营建中,太监扮演着重要角色:太监阮安负责营造北京九门城楼与三大殿重建,成为著名的建筑天才;太监刘瑾曾任内官监掌印太监,掌控官殿营造与材料采办,贪赃枉法,被抄家时查出“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最终被凌迟处死。太监的专权,不仅加剧了官场的腐败,也让皇木采办成为滋生贪腐的温床。《金瓶梅词话》中就记载了太监刘公公的兄弟“拿皇木盖房”的故事,暴露了皇木管理中的巨大漏洞。这些太监的命运,与明朝的宦官政治紧密相连,他们凭借皇帝的信任专权乱政,最终也大多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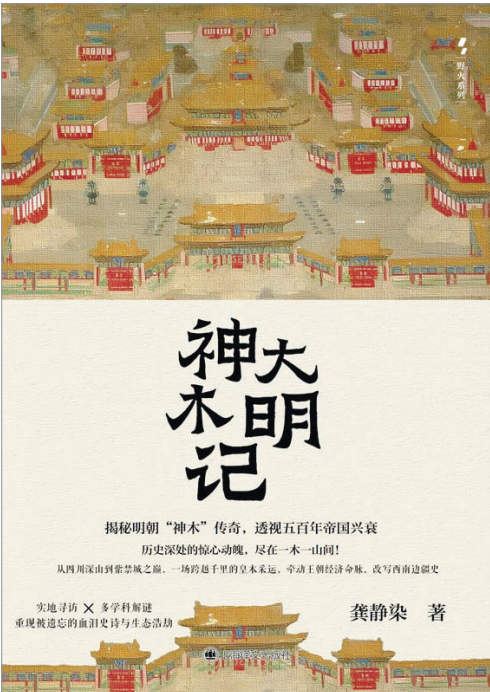
而那些身处底层的役夫与工匠,是这场历史大戏中最沉默的群体。他们“背井离乡、抛妻弃子”,在深山密林中砍伐巨木,在千里水路中拖拽木筏,用生命铺就了皇木之路。书中引用《蜀故》的记载:“委官幕役疲死、杖死、客死,禁于圜、羁于旅、行乞于市,前后相望”,这便是他们命运的真实写照。偶尔有幸运者能改变命运,如嘉靖年间的木匠徐杲,因重修万寿宫有功,被升为通政司侍郎(正三品)并享受工部尚书俸禄,成为史上罕见的工匠高官。但这样的例子寥寥无几,绝大多数役夫与工匠,都如尘埃般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留下姓名,只留下“入山千人,出山五百”的悲惨谚语。

这幅众生图谱,展现了权力游戏的残酷与人性的复杂。每个人都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与欲望,或迎合皇权,或争夺权力,或挣扎求生。

生态之殇是被遗忘的自然代价

当我们聚焦于皇木采办的政治博弈与人物命运时,《大明神木记》还揭示了一个被遗忘的重要维度——生态之殇。近两百年的大规模皇木采办,给西南边疆的自然环境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成为大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又一重要伏笔。

西南地区原本是中国生态宝库,“峨岷之属,梗楠豫章,槲之百围”,马湖府境内的原始森林中,“树围百尺者不知其



数,超过一丈的巨树也有不少”。这些千年古树,是生态系统的核心,维系着当地的气候、水文与生物多样性。然而,为了满足紫禁城营建的需求,明朝朝廷对西南楠木进行了无节制的砍伐。从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一批又一批的采木队伍深入深山,“斧斤斯人,林披薄斂”,将成片的原始森林砍伐殆尽。

书中记载,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三殿火灾后,朝廷再次大规模采木,此时的西南山区,楠木已“所剩不多”;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第三次火灾后,皇官重建竟拖了十八年才开始,原因之一便是“楠木被砍得所剩无几”。近两百年的砍伐,让西南边疆的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三百年巨木砍伐殆尽,森林湮灭”,曾经的“神木山”,变成了秃山荒岭;原本“飞流怒滚”的溪流,因森林涵养水源能力下降而时常断流;依赖森林生存的野生动物与少数民族,被迫迁徙他乡。

生态的破坏,直接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森林湮灭导致水土流失加剧,西南地区的自然灾害频发,洪水、泥石流等灾害不仅威胁着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也破坏了皇木运输的通道。同时,生态环境的恶化,让当地百姓的生存变得更加艰难,“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这也是明朝后期西南地区农民起义与土司叛乱频发的重要原因。

清朝初期,统治者吸取了明朝的教训,对皇木采办采取了节制政策。康熙皇帝听从大臣王骥的建议,“停办四川采木”,转而从塞外采办松木替代楠木。《清实录》记载:“明朝官殿俱用楠木,本朝所用木植,只是松木而已”,这种转变,既是对明朝奢侈浪费的反思,也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然而,明朝近两百年的生态破坏,影响深远,西南地区的自然环境直到今天也未能完全恢复。

“历史深处的惊心动魄,尽在一木一山间”,《大明神木记》的扉页上,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这部作品的核心内涵。一根楠木,看似微不足道,却串联起了大明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边疆治理与生态环境,成为解读王朝兴衰的钥匙。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权力的游戏与人性的复杂,看到了个体的苦难与历史的残酷,看到了自然的脆弱与生态的重要。龚静染以深厚的文学功底与扎实的学术素养,将这段被遗忘的历史写得既有文学之美,又有历史之厚重;既让读者感受到历史的温度,又引发了对现实的深刻思考。

六百年过去了,紫禁城依然矗立,而那些采木的役夫、专权的太监、挣扎的土司、奔波的大臣,都已化为历史的尘埃。唯有那根沉默的楠木,依然在诉说着六百年前的故事。它提醒我们,历史从未远去,它就隐藏在每一件文物、每一座山川、每一个传说中,等待我们去发现、去解读、去反思。

透物见史 文明坐标上的古代器物

欣菲



《思接千载：115件文物里的古代中国》，中国国家博物馆编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5月出版。

《思接千载：115件文物里的古代中国》是国家博物馆推出的一部“专业性与普及性兼顾、艺术性与可读性并存、知识性与情感性共融”的通识科普图书。全书以国博“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的历史脉络为骨架,沿着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明清时期的时间轴线徐徐铺展。通过甲骨铭文、青铜礼器、陶瓷书画等器物串联起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引领读者徜徉书中探寻古代中国,感受中华文明的呼吸与脉动。

该书从“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的2000多件文物中,以历史典型性、公众知名度、教育关联性为标准,选取了115件见证中华文明进程的珍品,用图文并现的方式进行重点解读。其中,有众所周知的“后母戊”青铜方鼎、四羊青铜尊、击鼓说唱俑,有历史课本提及的战国时期的青铜冰鉴等文物,有永久禁止出境展演的珍贵文物,还有被时下年轻人追捧的孝端皇后凤冠、鹰形陶鼎等。

这部书的作者团队来自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美术史论等专业,9名兼具专业功底与科普能力的年轻人守正创新,为静默的器物赋予鲜活的生命。书中115篇短小精练的文章记录着115件传世文物,让古老的文物从展柜中轻快地跃到书页上,普及着丰富而有趣的文物历史知识。他们以多维度的创作激活文物与历史的感知点,每篇文章聚焦一件文物,用通俗的语言介绍专业的知识,如《隋唐五代时期》一章中,作者对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采用了虚构框架的写法,读来颇有趣味“唐开元十一年(723年)夏季的一天,长安的一家明器作坊接到了一笔‘大订单’——为

刚刚去世的鲜于庭诲将军制作一批随葬器物……”这个引人入胜的开头如一部即将展开的精彩小说。这篇文章生动地记述了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的制作过程及历史背景。陶俑作为盛唐气象的重要代表,随葬于地下,为达官显贵构建出期许永生的绚丽世界。而那些已被历史长河冲刷无痕的工匠肯定想不到,他们的作品在千年后重现人间,成为广受欢迎的“明星文物”。这种“大胆构思故事,小心斟酌史实”的写作方式,既保持着对文物探究的学术深度,又消融了文物与大众之间的认知障碍。

书中除了严谨详细地介绍文物的时代、材质、尺寸、发现时间等信息,还生动地讲述这一文物背后的历史样貌。如众多博物馆爱好者家里的冰箱上都有孝端皇后凤冠的冰箱贴。书中写道:“作为明神宗生前唯一的皇后,孝端皇后恪守本分、尽职尽责,稳坐后位长达42年。”然而,虽然她独享凤冠的“权力之重”,却无法扭转明代由盛转衰的局面。大明王朝灭亡的丧钟已清晰可闻,这件极尽奢华、尊贵无比的凤冠,也成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历史见证!一只凤冠诠释了“欲享其尊,必承其重”的历史哲思。

除了创新的叙述手法,该书在知识呈现的系统性上也颇具巧思。每一历史时期都有相关的知识专题,跨时代、多主题地进行横向、纵向的对比。如夏商西周的青铜器型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书中呈现出的图解表,则帮助读者轻松了解青铜器的类别与用途。“度量衡体系的建立,是人类对秩序的本能追寻”,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布币知尺开始走向标准度量,五花八门的度量衡见证着先民的智慧之光。简牍与纸张作为书写载体,记录着历史的盛衰变迁。书写工具亦形制多样,从东汉的松塔形墨到清代的松竹梅纹臂搁,这些小巧的器物里暗藏着书写者从握卷而书到伏纸挥毫的姿势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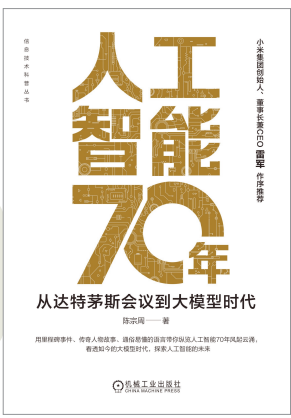
值得称道的是,这部书并未局限于对“重量级”国宝文物的呈现,魏晋文人饮茶的青瓷盏、宋元百姓家用的陶制炊具、明代民间女子的银簪等日常器物也入选书中。读者得以在纸上触摸古人生活的温度,窥见朝代的流转变迁,感受古人的起居日常与喜怒哀乐,这些藏在器物中的细腻信息,与今天的我们血脉相连、息息相通。

当读者在书中与古人古物展开跨时空的物我对谈时,越发看懂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蕴含的创新、统一、包容、和平的基因,对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生出深深的敬畏,以及持久的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国人的身份认同。这部书让阅读成为一场向上回溯的寻根之旅,也给我们注入了走向未来的底气与自信。

人工智能的回响与启示

小柔荐书

《人工智能70年：从达特茅斯会议到大模型时代》，陈宗周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5年8月出版。



在技术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人工智能已从科幻想象蜕变为日常现实,却鲜有人真正了解这条蜿蜒曲折的来路。《人工智能70年:从达特茅斯会议到大模型时代》带领读者了解人工智能从孕育到爆发的完整历程,同时引领读者从书中寻找对未来的启示。

《人工智能70年:从达特茅斯会议到大模型时代》以“编年史”为叙事架构,将人工智能发展大致划分为“孕育”“寒冬”“复兴”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又细分为多个转折点,采用讲故事的手法将复杂的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从专业理论和技术突破过程转化为科学家们的“探索故事”,使枯燥的科普类读物显得生动活泼。

书中详细描述了人工智能遭遇的多次“寒冬”——当乐观预期未能实现,资金撤离,研究停滞的艰难时期。这些历史低点恰恰构成了全书的精华部分,提醒我们,技术革命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浪漫旅程,而是充满试错与反思的艰难攀登。作者通过这些历史教训,巧妙地解构了当下对人工智能要么过度追捧、要么过度恐惧的二元对立,展现了一种更为平衡和理性的技术观。

这部书的独特价值还在于其中国视角。在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历史大多由西方叙事主导,而陈宗周系统梳理了中国人工智能研究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部分领跑的发展轨迹。这种非西方中心的科技史观不仅填补了历史叙事的空白,在中美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这种视角显得尤为珍贵和必要。

面对人工智能的未来图景,陈宗周既没有陷入盲目乐观,也没有坠入悲观想象,而是采取了一种谨慎且开放的态度。他告诉我们:人工智能涉及的伦理边界和社会影响从来不是科技

桐骁

本身所能完全决定的,而更应该是全人类乃至整个社会共同参与的过程。这就避免了唯科技论所导致的人性缺失,人工智能绝不是冷冰冰的奇技淫巧,而是基于人伦理性的温情符号,这就把人工智能的发展纳入一个可控系统,而非成为人类发展史的对立面,恐惧和排斥、极端与放任这两种态度都不是发展人工智能所应有的理性色彩,可喜的是,作者用中国式的解读赋予了人工智能人文色彩,让我们可以预见,具有中国人文精神的人工智能可能引领未来世界潮流,我们拭目以待。

书中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就业冲击、隐私问题、算法偏见等挑战都进行了深入探讨,但这些探讨不是简单的警示,而是启发读者思考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伦理规范和人文关怀来引导技术向善。他关注技术背后的人——那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科学家、企业家和政策制定者,更关注技术面前的普通人——如何适应智能时代的生活和工作变革。这种人文视角使本书超越了一般的科技史著作,成为一部思考技术与人类、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具有哲学思辨的科技类作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七十年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带有哲学意蕴的判断:人类永远是社会的主体,一切科技的存在必定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石上,离开了这一点,人类的科技便没有未来。只有深刻理解人工智能如何走到今天,我们才能更好地塑造它明天的模样。这或许正是本书最大的价值——它不仅是对过去七十年的总结,更是对未来七十年的启迪。

作者始终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与当下社会的交织。在书中,陈宗周直面人工智能发展中的“真问题”:当AI替代流水线工人、客服甚至程序员时,如何应对就业结构的冲击?当深度算法可以伪造视频、声音时,如何守护信息时代的“真实性”?如何平衡技术效率与公共利益?当AI在医疗诊断、司法量刑中拥有“决策权”时,如何界定责任边界?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作者为读者提供了思考的路径——既不盲目乐观于“AI拯救世界”的幻想,也不偏激悲观于“AI威胁人类”的焦虑,而是倡导一种“理性共生”的态度:人工智能是人类工具的延伸,也是人类文明的镜子,其发展的方向,终究取决于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认知与坚守。

《人工智能70年:从达特茅斯会议到大模型时代》也并非完美无缺。书中对近年技术突破的叙述稍显简略,部分关于未来的预测也可能需要结合最新进展进一步补充。但这并不影响该书的价值——一部历史著作的意义,从来不是预测所有未来,而是通过对过去的梳理,为理解未来提供坐标。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无疑完成了它的使命。